

在历史的天平上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袁本文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周恩来是一位巨人，一位历史巨人，一位充满着无穷魅力的伟大历史巨人。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作为对手和朋友的张学良在20世纪末、周恩来逝世20多年后这样评价他：“我认为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的人里，佩服的几个人，佩服周恩来是第一个，我是非常佩服他。”

学术界、理论界对周恩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而丰富的成果，但对他的研究是没有穷尽的，也是无法穷尽的。

本书研究探讨的时间段是1936年至1945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伟大时期。西安事变发生在这个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于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个时期，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也在这一时期。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统帅杨虎城两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不愿再参加“剿共”内战，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功臣。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周恩来说服张学良、杨虎城同意接受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回南京的建议，并与蒋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在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致使西安局势出现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他力挽狂澜，阻止了东北军内部出现的自相残

杀,维护和巩固了西安的和平局面,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使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得以实现,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长期内战局面,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使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促成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从此拉开了序幕,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形成。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在这场空前的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两个严峻的事实:一是作为炎黄子孙,他们必须与全国人民一道,以对民族的高度忠诚和责任感,同蓄谋已久、妄图吞并中国的强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的搏斗;二是捐弃前嫌,与十年政治军事“剿共”的中国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善于把握好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斗争中发展自己,在斗争中争取和团结盟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引领抗日战争的方向,取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自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作为中国人,作为抗日战争这场伟大斗争的参与者之一,经历了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作为长期生活、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最高

领导人，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和实践者。他利用抗日战争这个大舞台，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大旗，充分施展自己的卓越才能，把决策者和执行者、实践者的多重角色完美地结合起来，为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周恩来是纵横家。为维护 and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主动出击，合纵连横。对内，他联合国民党抗战派，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反对亲日派和投降妥协倾向；对外，他广交朋友，共同抗日。上自同盟国政府要员，下至普通士兵，周恩来不放弃与他们交往的每一次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性，从而赢得了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广泛尊重和同情，给国内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 1941 年 5 月在重庆与周恩来会面后，这样评价他：“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立场。”通过周恩来，更多的国内外人士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共产党人有了鲜活的认识。

周恩来是谈判大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团体的组合。有利益的不同，就必然有矛盾与冲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谈判，许多宝贵的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谈判桌上，他坚持“有利的应该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主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地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通过以周恩来为主要代表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进行的谈判，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冲突迭起，矛盾不断，

但始终没有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是卓越的谈判大师。

这一时期是周恩来一生中的黄金时间。他度过了从38岁到47岁的岁月。不惑的年龄、成熟的心理和超群的智慧,凸现出了周恩来极富感染力的人格魅力。在共产党人眼中,他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楷模;在对手看来,他是难以战胜的却又能够“由公谊而增私谊”的可畏而可敬的对手;在盟友面前,他是知识渊博的通才,推心置腹的知己,危难之中的及时雨、雪中炭。他是智慧的化身,说理的高手,真诚的使者。透过周恩来,人们认识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不惑的年龄、成熟的心理和超群的智慧,铸就了成就伟大的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居功至伟。长期的艰苦谈判,舌战群儒,他变不利为有利,获得了理想的结果。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谱写了别人无可比拟的华美乐章。周恩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上,周恩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因为有了周恩来,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胜利的辉煌更加耀眼;因为有了周恩来,中国革命史色彩更加斑斓;因为有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史就更是波澜不惊;因为有了周恩来,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中,历史的天平就自然而然地倾向了共产党这一侧。

本书不是一部周恩来的传记,也不是一部思想史。笔者把周恩来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背景下,试图探寻他如何扮演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双重角色,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伟大的抗战实践中展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对民族独立自由的不懈追求,展示一个共产党人的独特风格及他如何丰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着重从周恩来本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关系角度来进行正面阐述,将有关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他本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特别是抗战初期任职长江局时的失误忽略不论。这样安排显然容易出现疏漏。加之水平所限,书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教。

本书在拟定大纲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彦奇教授的悉心指导。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秦宣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陈答才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贺福等学者的多方指导和帮助。这些指导和帮助极大地鼓舞了作者,鼓励作者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向上述专家、学者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及所有关心支持作者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2003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团结抗日的号角(上)	(1)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1)
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5)
三、张学良:“现实使我感觉一切全不对头。”	(10)
四、肤施会谈:西北局部统一战线形成	(19)
五、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坚定倡导人	(33)
第一章 民族团结抗日的号角(下)	(44)
一、西安事变爆发,力主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	(44)
二、临危受命,成为解决事变的主心骨	(48)
三、张学良被扣后,力挽狂澜,维护和平局面	(63)
第二章 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促成者	(78)
一、西安谈判:艰难与成功从这里开始	(79)
二、杭州谈判:与蒋介石面对面	(86)
三、庐山谈判:蒋介石出尔反尔,周恩来针锋相对	(91)
四、南京谈判:瓜熟蒂终落	(95)
第三章 纵横捭阖,开拓统战工作新局面	(99)
一、才堪大任,代表中共中央协筹山西抗战	(99)
二、因地制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2)
三、出任长江局副书记兼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	(116)
四、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122)
五、广交各界朋友,寻求共同抗日	(130)
第四章 协调国共关系,维护统一战线	(140)
一、日本政府频施利诱,国民党当局对抗日妥协动摇	(140)
二、遇事协商——以谈判求国共团结抗战	(143)
三、皖南事变前后:力阻反共高潮发生,政治上组织全面 反击	(152)
四、反击《大公报》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	(165)
第五章 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巩固统一战线	(174)
一、争取中间党派,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176)
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
三、争取和联合地方势力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2)
四、广泛团结、教育和保护知识分子	(209)
五、扩大抗日国际统一战线	(219)
第六章 鲜明的统战工作特色	(224)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228)
二、广交朋友,共同抗日	(231)
三、关怀朋友,风雨同舟	(234)
四、以诚感人,以理服人	(238)
五、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策略	(242)
六、始终倡导和坚持政治协商	(249)
第七章 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	(252)

一、“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	(253)
二、“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	(255)
三、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	(261)
四、总结了统一战线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和准则	(266)
五、“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	(269)
六、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276)
第八章 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	(280)
一、加强国际联系,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支持,建立国际 反日统一战线	(280)
二、争取国际舆论,压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维护统一战线	(285)
三、欢迎国际援助,但强调接受援助要以自力更生为前提	(287)
四、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反对外来干涉	(290)
结束语	(294)
一、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294)
二、周恩来的统战工作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开展的	(296)
三、周恩来的统战工作极富创造性	(297)
参考书目	(299)

第一章 民族团结抗日的号角(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毛泽东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上升,将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谋救国大业成为当务之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西北局部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建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为一体的西北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1931年,正当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调动自己的军队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内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事变。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集团军——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贼喊捉贼,反诬中国军队——东北军——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关东军派兵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在蒋介石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不抵抗”的命令下,尽管有一部分官兵违抗蒋介石的意志,奋起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但无济于事,根本阻止不了侵略者进攻的脚步。一夜之间,日军占领沈阳城,并向东北其他地方发起了进攻。在“不抵抗”政策的扼制下,留守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关东军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沦陷。9月底,辽宁(不包括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日军再占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1932年2月,黑龙江全省沦陷。至此,整个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生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这就是让中国人永生不会忘记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使中国各阶层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的屈膝退让政策无不义愤填膺,自发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此时,中央红军正进行着激烈的抗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1931年11月宣告成立)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族“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中国工农士兵劳苦民众“拥护反帝运动的惟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文件提出: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要“大胆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但是,由于此时国民党正调集30万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围剿”,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把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看做反苏战争的前兆,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九一八事变“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视而不见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国内引起的社会阶级的新变化,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

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临时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是所谓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临时中央没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来,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会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临时中央还由此断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①周恩来作为临时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名成员,其思想明显地受到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掣肘。1931年12月底,他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中央苏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上如何打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周恩来到达苏区后的主要任务是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并领导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1933年8月,移师福建“剿共”、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派旅法时曾同周恩来在一起的吴明(陈公培)作为代表到福建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要求进行共同合作,抗日反蒋。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9月22日,他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建议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与吴明进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红军与十九路军在前线进入了休战状态。10月26日,双方在弄清各自的真实意图后,在江西瑞金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

^①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双方间的相互敌对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之后，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中央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双方的敌对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其后，十九路军从福建往中央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部分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十九路军是“剿共”的一支强敌，协议签订后，红军与十九路军化敌为友，如果配合得当，将会给红军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有力的支持。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领导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24日，周恩来与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易、寻淮洲发出指示，要求赣东北红军借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蒋介石调兵向浙赣边境集中之际，开展游击战，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同一天，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以中央红军第三、第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蒋介石军队，支持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活动。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而不予支援。周恩来的建议未被采纳。不过，客观地讲，即使周恩来的建设被采纳，其主要效果只是求得与十九路军的协同，减轻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和十九路军抗击蒋介石的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共中央此时无暇采取实际行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缺乏支援的十九路军失败了，福建人民政府流产。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因蒋介石重兵进攻，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红军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到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在军事上同

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还提出要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外无支援，主动要求联合红军的十九路军被临时中央拒之门外。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与不利局面。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了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开始。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因一二九运动而起的全国性抗日救亡浪潮此起彼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历时一年的战略转移胜利结束。这为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局势和全国的抗日浪潮使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此，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地位。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中共中央真正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成为“石达开第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陕

北后,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蒋介石必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中央红军身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必须寻找出路,摆脱包围。同时,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瓦窑堡会议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找到了光明之路,为中国共产党在将要到来的新的历史时期掌握了政治上的充分主动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与下面这些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遵义会议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摒弃了“左”倾中央的关门主义和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敌人的错误,这为客观分析自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华北事变和随后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使中共中央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侵略意图,对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有了直观的认识。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了对华北的掠夺。1935年6月初,日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两市和河北省;接着又策动华北五省(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11月,又唆使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12月,国民党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

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再也阻挡不住了。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步步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断妥协退让,感受最为深刻,反应最为强烈。在国民党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宣布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深感华北沦

陷已迫在眉睫。身处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为敏感和关切。他们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1935年11月1日，北平、天津1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自由宣言》。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投降政策，痛陈当今之中国“惟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9日，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城内外的大中学生与市民举行了规模比9日更大的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延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学生运动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文化界起来了！海外侨胞和留学国外的学生团体起来了！一场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扩展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这场史称一二九运动的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评价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性的救亡浪潮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明了方向。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中国因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华北事变表明日本“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提出“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和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反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陕北局部面临的军事环境也是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边区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但“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人数众多，是红军的主要对手。东北军是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主力，也是一支有着强烈抗日要求的部队。如何对待东北军的抗日要求，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苏区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林育英）、邓